

## 书评

◀ (上接 13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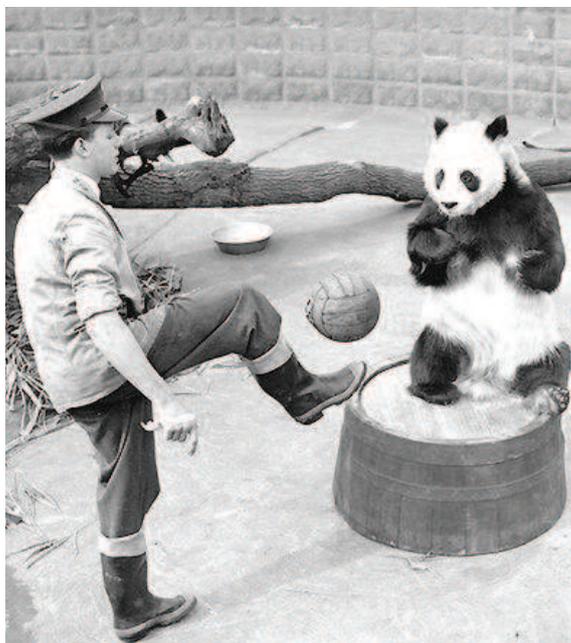
过是“传闻中的话题”(the stuff of rumour)而已。

在熊猫被“发现”之后，“西方探险家纷纷涌入中国四川西部，一场追逐熊猫的竞赛就此开始。”(《故事》，第139页)这个时期的捕猎活动无疑对一些地方的熊猫种群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如胡锦涛所言，“如30-40年代西方国家到汶川草坡一个乡，猎杀、捕捉大熊猫达30多只，而今经过了60余年，那里的种群仍未能完全恢复”(《大熊猫研究》，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82页)。

但国内的主流熊猫书籍经常将“中外友谊”作为重要的基调之一。《故事》大力渲染“人人(外国人都爱大熊猫”(即全书后三分之一的大标题)，却在无意中淡化了当年熊猫惨遭屠戮的实情。书中反而叙述了当年的猎人们的忏悔。例如，在目睹第一只被带到美国的熊猫“苏琳”时，小西奥多·罗斯福上校(罗斯福总统的儿子、最早猎杀熊猫的美国人)如此说道：“如果要把这个小家伙当作我枪下的纪念品，那我宁可用我的小儿子来代替。”(第139-141页)

《自然遗产》一书将这段史实主要放在《近代西方世界对大熊猫的认识与猎奇》一章内叙述(第52-53页)。该章罗列了重要的捕猎者，还总结了这种活动的规模(“1869-1946年间，国外有200多次前来中国大熊猫分布区调查、收集、捕捉大熊猫”；“仅在1936-1946年的10年间，从中国运出的活体大熊猫计有16只，另外至少有70具大熊猫标本进入外国的博物馆”)，但总体上看，该书对于这段历史的评价是较为克制的。最为尖锐的批评，不过是说当时熊猫“惨遭猎杀和盗捕”，“给大熊猫资源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第78页，此处并未展开这个话题)。

我们再来看看尼科尔斯的写法。他比较详细地叙述了罗斯福兄弟、塞奇远征队、“熊猫王”史密斯等重要盗猎者的行径，揭发了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美国自然史博物馆、史密森国家自然史博物馆等机构的不光彩角色，就连塞奇(Dean Sage)一伙“大啖熊猫肉”(feasted on its flesh)的丧心病狂也并不避讳。他还指出，那么多西方人可以此为所欲为地干这些“殖民主义”的勾当，是由于民国初年军阀混战、国民政府尚未树立权威。不仅如此，他还在美国当时的文化语境中解释了猎杀熊猫的现象：当代意义上的环保观念尚未形成，各大自然史博物馆之间的竞争反而推动了猎杀动物、制作标本的风潮；当时还有许多人以为狩猎能



▲身为一只年轻的熊猫，姬姬逗趣的模样深深吸引了英国民众。图为姬姬与身着工作服的专属管理员艾伦·肯特踢着足球，1959年5月摄于伦敦动物园 均资料图片

够彰显男子的气概。正因为如此，在那个“从拿起枪追捕动物到拿着镜头捕捉它们的过程尚未完成”的时代，那些鼓吹猎杀动物的人，往往也就是环保主义的先驱(第3、4章)。

### “相亲”失败的海外“独苗”

第一只进入西方国家的活体熊猫，是露丝·哈克尼斯(Ruth Harkness)于1936年带到美国的熊猫幼仔“苏琳”(Su-Lin)。它在芝加哥布鲁克菲尔德动物园展出，立即轰动了美国。哈克尼斯女士的冒险传奇，尼科尔斯绘声绘色地做了讲述(第4章)。但新中国建立之后，西方人直接从中国获取熊猫的渠道即被切断。1953年，“美兰”(Mei-Lan)在芝加哥死去，从此整个西方世界都没有活的熊猫了。“熊猫热”在西方的再次兴起，归功于在1958年到达欧洲的“姬姬”(Chi-Chi)。

《自然遗产》一书并未直接提到“姬姬”。这可能是因为它出国并非官方行为，很难纳入“熊猫外交”的叙述框架(聂晓阳，《特殊的友好使者》，第213-217页)。《故事》倒是比较完整地讲述了“姬姬”的经历：一位奥地利商人用一群非洲动物与北京动物园换取了一只熊猫，将它运到了欧洲；它在伦敦动物园定居，成了英国的明星动物；它两次与莫斯科动物园的“安安”(An-An)“相亲”，均告失败，最终孤独一生；新生的WWF还采用它的形象，设计了自己的标志(第148-153页，详见下文)。

谭楷的叙述虽然生动有趣，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却不够深入。相比之下，在《熊猫的路》中，“姬姬”是全书中间三分之一的主角，几乎独占了四章的篇幅。尼科尔斯并不满足于仅讲述熊猫的“环游世界之旅”，还相当到位地将“姬姬”的一生嵌入了冷战时代的社会背景。由于当时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禁运”政策，就连一只熊猫都无法入境美国(尽管它本来就是芝加哥动物园预订的)；它一路向西飞行，先经由莫斯科到达东柏林，再设法穿越无形之“墙”的阻隔，取道西柏林进入了西欧；它在各地的动物园巡展，先从法兰克福到哥本哈根，然后又到了伦敦，利用各种机会努力“吸粉”；这时候它刚好赶上了电视这种新媒体的兴起，结果幸运地在伦敦动物园安家落户，还取代了刚刚仙逝的北极熊“布鲁玛斯”(Brumas)留出的空位，成了那里的大明星——是电视台帮助动物园承担了大部分的价钱，还以《动物时间》(Zoo Time)这档节目捧红了它(第5章，另见第130页)。

“姬姬”与“安安”的“政治婚姻”最终还是失败了，这是书中最有分量的段子。其实这件事的出现同样具有很大的偶然性。首先，由于北京动物园的失误，中国送给莫斯科动物园的两只熊猫都是雄性的。在当时的整个欧洲，让“姬姬”与“安安”在一起就成了配种的唯一可能性。其次，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动物园通过国际合作人工繁育动物的设想刚刚出现，而北京动物园也在1963年完成了全球首例圈养熊猫的人工繁殖。接下来媒体推波助澜，起了很大的作用。1966年，就在“姬姬”即将前往莫斯

科“相亲”前夕，碰巧传出了时任英国首相威尔逊将要出访苏联的讯息，导致这件事直接被漫画化了，成了报纸讽刺挖苦两国领导人的材料；更麻烦的是，伦敦动物园派往莫斯科的一个动物专家，刚好与军情五处的某个特务头子有联系；努力了半年之后，两只熊猫的“相亲”最终无果，而这件事又被媒体借题发挥，用来讽刺当时英国外交大臣对苏联人的巴结。1968年，就在“布拉格之春”发生之后不久，熊猫的“相亲”活动再次启动。这次是苏联的“安安”登门造访，来到伦敦“追求”“姬姬”。然而大半年之后，“安安”还是一事无成地回到了莫斯科。尼科尔斯指出，就当时不成熟的人工繁育技术而言，要想让“姬姬”生儿育女的可能性其实是非常小的；但那时候正是“性解放”开始的年代，前后五年之久，两只熊猫之间源源不断的故事被媒体大肆炒作，通过数十种语言的报道，传播到了全世界(第7章)。

### 成为会徽的明星动物

一般认为，世界自然基金会(即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在1986年之前称World Wildlife Fund，本文一律简称为WWF)的标志就是根据“姬姬”的形象设计的。这件事为所有熊猫书籍津津乐道。《故事》两次谈到了WWF的标志。在赞美熊猫的宝贵时，该书精彩地述说道：“1961年，还是东西方尖锐对立，中国国门未启的年代。全世界的动物学家汇聚一堂，一致同意由英国勋爵斯科特设计的熊猫图案作

为世界自然基金会的会旗和会徽。WWF在一篇宣言中写道：“大熊猫”不仅仅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也是世界各国人民所关心的自然历史的宝贵遗产。”(第23页)在讲述“姬姬”的故事时，该书又说道：“英国的斯科特勋爵曾在伦敦一睹姬姬芳容，留下了难忘的美好形象……那是冷战中东西方剑拔弩张的岁月，出身于中国的熊猫光荣地成为会徽，熊猫让人们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对立，成为全世界认可的美的形象。”(第152-153页)

《自然遗产》专门叙述了WWF与中国的关系(李宁，《大熊猫与世界自然基金会》，第207-209页)。关于其熊猫标志，该章是如此介绍的：由于“姬姬”的影响，WWF的创始人意识到了熊猫的号召力，认为它的外形和颜色很适合作为醒目的标志，于是其首任主席彼得·斯科特就在此基础上设计了该组织的最初标志；这个标志成为WWF与众不同的形象代言，被国际上视为自然保护运动的象征。按照该章的说法，“‘到大熊猫的家乡——中国去开展项目’，是WWF成立之后的一个梦想”；“20世纪80年代，一个以大熊猫为标志的国际机构来到中国，使生活在西部连绵群山之中的大熊猫成为当今国际野生动物保护的象征。”

与其相比，在尼科尔斯笔下，熊猫与WWF的故事就要生动得多了。首先，在讨论机构标志的时候，WWF的创始人只花了大约20分钟就选定了熊猫，当时他们不太可能考虑到了熊猫对于中国人的意义，并不知道在六十年代熊猫已经成为中国的国家象征(national icon)了。其实，他们看中熊猫的原因是：能够传达濒危的概念，好看，缩印之后仍然易于辨认(仅有黑白二色)。就这样，这群人在遥远的伦敦选择了熊猫。不仅如此，虽然熊猫已经成了WWF用于宣传和筹款的标志，但在成立初期，该机构的工作重点其实是保护非洲的野生动物。按照尼科尔斯的说法，“直到1979年，WWF才转向中国和熊猫”，而这一变化主要是美国女记者南希·纳什(Nancy Nash)个人偶然地推动的——是她利用自己曾在香港工作过的经历，找到了中国的有关部门，最后克服重重困难，促成了WWF与中方合作的熊猫研究(她也因此被称为“熊猫小姐”)。尼科尔斯甚至还补充说，在1986年WWF改名之后，熊猫的标志惨遭改头换面，失去了斯科特原版设计的神采，变成了一个有点像狗的东西，令斯科特和纳什颇为失望(第6章)。

(下转 15 版) ➡